

瑞安学者 揭开温州考据学序幕

■俞光

清前期，在强烈的遗民意识和对清朝统治的抵触情绪下，温州学术总体比较沉寂。到中期，在国内考据之学盛行的影响下，温州学术开始复苏，其标志是孙希旦撰《礼记集解》、鲍作雨著《周易择言》、方成珪作《集韵考正》，三人揭开了温州考据学的序幕。



孙希旦像



方成珪像

孙希旦撰《礼记集解》

孙希旦(1736—1784)，字绍周，自号敬轩，瑞安人，居桐田里(今属碧山镇)。乾隆三十四年(1769)会试得挑副榜，以内阁中书用，后任《四库全书》分校官。四十三年，会试进士及第，名列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散馆后，充武英殿分校官，兼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后积劳成疾，仅49岁便去世。

孙氏博学多才，精于诸经，尤深于三经。乾隆四十四年，丁母忧，家居。曾主讲温州中山书院，撰成《礼记集解》五十卷。该书以郑玄注、孔颖达疏为主，博取宋元以来诸家之说，删其繁芜，撮其枢要，对《礼记》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注释，对前人诂释不当之处，辄下其己义，予以驳正。

阮元《礼记集解序》言：“能于三千求其说，不厌其繁。”孙衣言《敬轩先生行状》称：“其大指在旁参群经以证明四十九篇之说，又博取后儒以疏通郑、孔之

室。故论者谓先生之言礼，其于名物制度，考索精详，可以补汉儒所未及。而其深明先生制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则又汉儒所不逮也。”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评道：“当乾隆初经学大师提倡未盛，先生独辟途径，研精三《礼》，博考精思，于《礼经》制度，参互研核，致多心得。其学求之近代，尝与张稷若、江慎修相颉颃。”“兼综汉唐宋诸儒及近代顾炎武、戴震之说，而无所偏主；并贯穿经文，推玩得之，不为意必之说；其余《记》文关涉《仪礼》《周官》两经，皆一一疏释其义，孔、贾两疏述郑或有违戾，亦为疏通证明。”该书为清代《礼记》注疏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中华书局将其列入“清人十三经注疏”之一种，校点行世，复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03—104册。孙希旦尚有《尚书顾命解》《敬轩诗集》等传世。

鲍作雨著《周易择言》

鲍作雨(1772—?)字瑞昌，号云楼，瑞安人，居县城。幼时聪明过人，弱冠补县学生员，得温州知府张慎初赏识，令人府衙受业。益致力古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兵刑、律历、方技家言，均有研究，尤致力于《易》。但历次省试，都不第而归。嘉庆十七年(1812)，成为贡生。道光元年(1821)，中举人。在京数年无所得。不久，同乡许松年调任福建水师提督，作雨被聘为幕僚，“为之修戎政、革弊章、汰冗卒、举滞员，条上《水利三议》《兵法五要》，当事采用，闽人至今啧啧称之”。五年，应聘修成《乐清县志》16卷，在温郡方志中被称为“善本”，孙诒让评为“渊雅”。十年，瑞安陈步云擢升定海总兵，聘作雨为幕僚，他帮助陈步云推行一系列改进海防的措施。不久，陈步云被调任福建福宁总兵，他也辞职回乡。

十二年，掌教瑞安莘塍聚星书院，著《周易择言》6卷，对于诸家易注皆有所取舍，截断明快，风格圆融一贯，自成一派。书甫成而卒。

项傅梅《周易择言·序》云“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而独于《易》性命相依，一身之出处，遇事之疑难，一一卜之于《易》。白发危坐，风雨一编，手丹铅不倦，参诸诸家《易》说，不断于汉宋门户。”孙诒让在《温州历代各家所著四部要籍评论》中说道：“鲍作雨《周易择言》，大旨主于明人事、辟《易》理，故所采旧说，宋儒居多。荀、虞爻象之蕴，未及详也。然其释《说卦·天地定位》章，乃力辨先后天诸图之妄，持论明确，与黄氏宗炎、胡氏渭诸人之论同。(其他)辨正陈、邵术数之学者甚夥，盖宗法程、朱而能不囿于门户者。”该书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8册。

方成珪作《集韵考正》

方成珪(1785—1850)，字国宪，号雪斋，又号瑶斋，瑞安人，居县城。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二十三年，考取内务部所属景山官学汉文教习。道光中，官海宁州学正，升宁波府教授。咸丰间以老病归卒。他酷爱购书、抄书、读书和校书，亦好诗。清贫乐道，除图书外，别无长物。《集韵》是一部官方颁行的韵学规范性工具书，流行甚广。方成珪以曹棟亭刻本为底本，参校宋槧本，收录了清时段玉裁等四家校勘成果，又遍引《经典释文》等诸书，订其讹误，补其疏漏，作《集韵考正》，此为方成珪的学术代表作。

孙诒让《方成珪先生雪斋传略》云：“成珪精研小学，勤于校讎。官俸所入，悉以购书，储藏数万卷，丹黄殆遍。尝谓古韵书之存者，莫善于《集韵》，因据宋槧本及近时段玉裁、严杰、汪远孙、陈庆镛校正曹刻之误，复以《方言》《说文》《广雅》《经典释文》《玉篇》《广韵》诸书，正宋槧及景祐元修之误，为《集韵考正》十卷。吴县吴钟骏及定海黄式三叙其书，深推其精博。”黄式三称：“雪斋渊博有识，因《集韵》之所引，寻求元本，并得各善本以校之。复得汪舍人、吴侍郎所校之本以参考之，为是书订其讹误，补其夺漏，名之曰《集韵考正》。书成于乙巳以前，续改于丙午以后，用功勤而校讎精，《集韵》自是成完书矣。”该书集小学类韵书之大成，其学术贡献已

经超过《集韵》本身，也是温州考据学术的奠基之作，更在中国音韵学上占有一席之地，影响至今。该书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53册。

方成珪又撰有《干常侍易注疏证》。该书对晋朝干宝的《易注》，参校岱南阁孙星衍刻、雅雨堂卢见曾刻《集解》、张惠言《别录》本、志林本等诸家，并于马国翰辑本有不少补充。孙诒让《方成珪先生雪斋传略》称：“又以晋干宝《易注》亡于北宋，因摭摭佚文，详为疏释，为《干氏易注疏证》二卷。”他在《干氏易注疏证·跋》中还云：“此书为吾乡方雪斋教授所著，校释精备，远出诸集本之上。”该书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8册。

方成珪还著有《字鉴校注》。他认为识字不仅要明其读音，“必深明乎源流正变，训诂异同，与夫点画之不可少讹，行用之不可稍紊，而后谓之能识字也。”采用元李文仲的《字鉴》，手抄一过，复加改订，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完成此书。孙诒让《方成珪先生雪斋传略》评道：“又谓流俗字书，承伪袭谬，惟元李文仲《字鉴》，述古准今，斟酌悉当，因详加考释，为《字鉴校注》五卷。”此外，方成珪还撰有《韩集笺正》十卷，订正宋廖莹中世彩堂本韩愈《集注》之误。该书亦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10册。经他精心校注的古籍尚有王定保《唐摭言》，孙诒让说：“其所考证多精确绝伦。”

一担河泥几身汗 万亩农田稻蔬壮

——马屿天井垟河泥肥田前尘拾遗

■虞秋生 朱焕较

曙光揭去夜幕黑纱，天井垟在薄雾中苏醒。微微泛着涟漪的马屿协山河河面上，6名满脸汗珠的社员站在一艘木船上，个个双手紧握捞河泥的笕箕，弯腰翘臀，用力后拗、前推、回拉、上提，满满的一笕箕河泥倒入船舱……这是1971年深秋一个早晨的劳动场景，当时马屿区董社协山河大队社员们趁着农闲，趁着好天气，在村边河道上捞河泥，积存有机肥料，为来年春耕做准备。

这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最后印象，1972年2月，瑞安合成氨厂在平阳坑建成，氨水成为肥田主力，河泥退居“二线”。1981年9月起，国产和进口尿素等化肥大量进入农村，农家肥被逐渐抛弃，河泥肥田传统在农村消失。近日，笔者一行前往马屿镇协山村，打捞这段前尘往事。

四色农肥同当家 河泥独占两分量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新中国成立后，浙南大粮仓天井垟一带农村庄稼地主要依靠家庭猪圈里那点猪粪增加肥力，稻蔬亩产量都不高。1958年，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农业生产走上合作化道路，开始集体化、规模化生产。农家有机肥料品种多了起来。用当年老农人的话来说，就是：“四色农肥同当家，催开农业丰收花。”

这四色农家肥是：红色的红花草(紫云英)、绿色的绿萍、棕色的猪牛粪、黑色的河泥。四色农家肥中，红花草占比最大，约占农田总量五成。晚稻收割后，不计划间种其他庄稼的农田，基本上都会撒上花草种子，由其在冬春季生长，春耕前翻埋腐烂，即可作农田基肥；董社、录社是瑞安、平阳绿萍种苗基地，天井垟近水楼台，移植很方便，肥田量占到二成；养猪是农家的标配，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都会养一至三头猪，栏圈里的粪便会被生产队用于肥田，猪粪肥料约占肥田总量一成；剩下的二成肥田量，则由河泥来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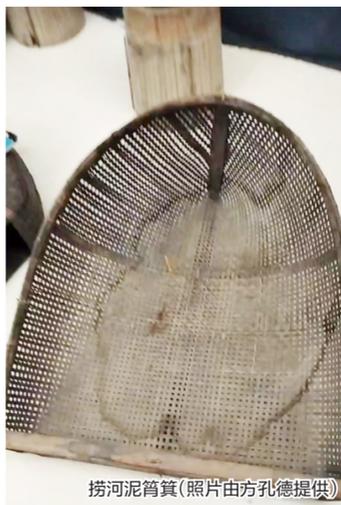
国家环保机构测定，河泥的有机质达12%，氮磷钾总量为5%，是优质复合肥。尤其是天井垟一带的协山、马岙、儒阳、许岙、高岙、山河、增光垟、姜家汇和上京等20多个生产大队，河道紧挨村庄，村中的鸡、鸭、狗粪便被雨水带进河中，生产、生活垃圾也被大雨冲入河道，河里鱼的种类、数量比较多，留在河底的鱼屎与路面冲下来的各类有机物相融合，使得河泥又黑又肥，质量比别处好。因此，天井垟一带生产队，每年秋收过后，就会组织社员到附近河道捞河泥，并把它存放在大坑中，以待来年使用。

捞泥存泥有讲究 四种农田最适合

捞河泥这活计看似简单，但没有一定“功底”的人还真干不了。6人或4人在长10米、宽2.5米的木船(后期改用水泥船)上作业时，若分别位于船头、船中和船尾的人员力量失衡或动作不协调，极易导致船体侧翻，或船头船尾翘起、单侧入水。水下作业，眼睛看不见，操作不当，笕箕就捞不到河泥，白忙活。因此，参加捞河泥的社员一般都是“老手”，至少是操练过3次的人。

天蒙蒙亮，捞泥人便来到约定的河道，摇船开捞；待到天黑时分，方才收工归家。他们干活只看天时，出工收工并无定规——晴天、阴天劳作，遇雨则歇。

捞河泥的笕箕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根长约六七米的竹竿，其末端固定着



捞河泥笕箕(照片由方孔德提供)



当年天井垟农民捞河泥场景

一个奋斗状的笕箕；以及一根连接在竹竿下端的绳索。使用时，社员立于船舷，手持竹竿。先收紧绳索，使笕箕与竹竿垂直，然后顺着船舷将笕箕插入河底。接着，双手握紧竹竿慢慢向后拗动(后拉)，推动插入淤泥的笕箕向前舀取河泥。待笕箕盛满，便双手交替上提竹竿，将笕箕提出水面。最后，把箕中河泥倾倒入船舱。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船舱装满为止。

捞河泥是极耗体力的活计。社员双脚扎马步立于船舷，弯腰近20度，双手反复使劲后拗、上提，没有哪个动作是省劲的。几轮操作下来，人人汗流浹背。一些过来人告诉笔者，这活儿“比打铁、撑船、磨豆腐还要辛苦”。然而，社员们总会坚持，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把汗，喘口气，接着干。约莫一个半小时后，待河泥满船舱，众人便摇船驶往卸泥点。

河泥捞起后需要贮存，以待来年春耕使用。捞泥前，生产队通常会预先挖好几个大坑。据今年66岁、曾任协山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蔡晋贤介绍，这些大坑都选在河道边，便于船只停靠和卸泥。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大队抽水机埠头大坑，各大队在抽水机埠头修建的大坑，原本用于缓冲水流，保护水渠，冬季农田无需灌溉，此坑闲置，且位于河边，便借坑存泥；第二种是田角地头大坑，在种植油菜籽、小麦的农田边，靠近河岸处挖坑贮存河泥，以便下一步就近施肥；第三种是临河靠路大坑，在既挨着河又靠近大路的农田边挖坑，便于将来外运。一个生产大队一般会预备6至10个这样的大坑。

河泥贮存于坑中，无需遮盖，也无需专人看管，风吹雨打日晒都无大碍。

河泥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为庄稼提供肥力，尤其施用在以下四类农田中效果最佳：一是秧田。天井垟一带的农民继承祖辈传下来的育秧经验：“要想秧苗长得好，河泥就要垫得厚。”每年春耕前，他们会将农田整理成垄，在田垄上铺设约1厘米厚的河泥，再撒播谷种，这种办法可促进发芽，提早出苗，且育出的秧苗根系发达，茎基粗壮、叶片宽大，长势尤为喜人；二是菜籽田。种过菜籽的农田，地力消耗大，菜籽收割后，需要施以河泥作底肥，以补充土壤养分；三是麦田。天井垟部分农田在晚稻收割后抢种小麦，利用冬闲增收，帮助社员缓解春荒后的“青黄不接”。麦子收割后需抢插早稻，赶在插秧前，施上足够的河泥，即可保障水稻正常生长；四是蔬菜种植地。春末夏初上市的黄豆、土豆、芥菜、包心菜、豇豆和丝瓜等六类蔬菜，施过泥肥的，不但能增产增收，口感也更好。

肉饭一碗动人心 舍命救人品高尚

捞河泥是个重体力活。刚刚忙完秋收，社员们体力尚未恢复，马上捞河泥，通常心里会有点打鼓。这时，生产队长会站出来大喊一声：“明天挖河泥，猪肉米饭管饱！”在那个年代，农村生活条件差，猪肉是稀罕物，更是奢侈品。一听有肉饭吃，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抢着报名。第二天临近午时，捞泥的农民看见本队社员抬着箩筐走来，就知道肉饭到了，立刻欢呼雀跃起来。船一靠岸，人就如箭似的奔向饭点，迫不及待挤到铁桶边打饭。有的社员耍小聪明，第一碗少打点，快速吃完，趁大伙还在吃第一碗时，抢先盛上满满的第二碗，生怕自己吃亏。“捞河泥，吃肉饭”，成了生产队长派活的绝招，屡试不爽，在捞泥人的心头也烙下了深深印记，几十年过去，旧事重提，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天井垟一带河道深浅不一，深处可达6米以上。为确保捞泥作业安全，各大队严格落实三项措施：队长全程跟班作业，严格控制船只载重量、时刻保持人船平衡。即便如此，意外仍时有发生。

1980年1月28日上午，天井垟西南角马岙大队队长蒋兆八带领社员蒋兆八和谢成滔，摇船至水深约5米的马岙河段捞泥。劳作一个多小时后，河泥装满了船舱，返回时，因超载沉船，三人一起落水。

据目击者介绍，谢成滔当年19岁，水性好、体力强，很快脱险上岸。然而，当他站定转身，发现队长与蒋兆八仍在河中挣扎，便再次跳进河里，奋力向两人漂游，抓住两人手臂向岸边游，但惊恐中的二人却本能地反手抱住他的大腿，使得谢成滔也无法动弹。待大队社员闻讯赶到现场救援时，三人已不幸溺水身亡。

谢成滔舍命救人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马岙大队全体社员。下葬之日，全大队男女老少都来送他最后一程。人们在他的墓前竖起一块大石碑，碑上题刻“舍己为人，铭刻千秋”。

又是一年端午节，笔者一行站在协山村驿马路，向北眺望，但见天井垟万亩农田绿浪翻涌，稻穗初吐新节，蔬菜郁郁葱葱。再过一个月，稻蔬丰收如期而至。“浙南大粮仓”不仅滋养着此方百姓的富足生活，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新希望。



扫一扫，看详情